

# 一代经济学大师 “彻底理论”的力量



十年前的今天,有着“一代经济学大师”之称的董辅初(1927-2004)溘然辞世,然而他的思想不死,始终散发着理性光芒。从平衡增长理论,到国家所有制改革,再到资本市场“发展论”和“婴儿论”,在共和国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对一些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董辅初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创新见解。他一生辛勤耕耘,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更重要的是,他坚守知识分子“守身为大”精神,一生正气,一身骨气,一股锐气。

他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提出国民收入平衡论跻身国际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道破传统公有制的症结,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人物;他勇敢地指出,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他还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上世纪80年代末,他提出的崇尚公平效益的社会目标坚定了人们的信念。这位被誉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前辈,就是董辅初。

这位经济学家大师辞世十年,其若干思想观点,因其仍具重大现实深远意义,常被现时经济学论著引述,有些理论观点及政策建议渐被决策机构和立法机构采纳,从而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师乘鹤西去,但思想光芒永存,身后实践应用,影响力量深远。正是这种力量,值得我们追思。

## ● 六大理论仍有现实意义 ●

董辅初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可概括为平衡增长论、所有制改革论、国有企业改革论、市场经济论、资本市场论、经济发展论、民营经济论六大理论。对照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及可预见的将来,这六大理论仍具重大现实深远意义。

1959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是董辅初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誉的成名作。其后有关“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具体化”的四篇文章,更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更加雄心勃勃”的“董氏再生产模型”。其核心思想可谓“平衡增长论”。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平衡增长论”所论证的不正是科学发展的经济学要义吗?

董辅初《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一文发表于中国经济改革发轫的1979年元月,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还是理论禁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是管理方法的改革,而是所有制的改革。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内容,不改所有制,经济体制各方面改革都不可能成功。而所有制的症结在于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其要害即“政企不分”。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在以后有关所有制改革的文章中,董辅初进一步论述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关系,阐述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一文中,董辅初进一步提出了“董氏八宝饭”即“混合所有制”理论。他还在所有制改革研究中得出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的结论。

董辅初在他的若干著述中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想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者,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才能实现。他批评只改变企业经营方式不改变全民所有制的观点,不同意当时盛行的两权分离的改革形式,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改革做法回避变革所有制形式问题,不触及国家所有制,不足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者,不能解决企业自负盈亏问题,所以两权分离的承包制不能成为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这种看法后来被改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的观点,非常明确地主张国有企业应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在非竞争性领域和社会公益性领域保留国有企业。董辅初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些理论及主张,有的早已被采纳推行,有的则见诸《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如“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这样的表述,很大程度可理解为其学术语言的官方文件表达。但毋须讳言,如“不触及国家所有制,不足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者,不能解决企业自负盈亏问题”这样的理论观点似乎仍属超前性理论观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改革浪潮,董辅初又一次站在潮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阐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一传统理解不同。董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公有制经济着眼于社会公平,非公有制经济则与市场竞争相联系,着眼于市场效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这又被称为“董氏市场经济公式”。想想当下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问题已成为严重问题,应用“董氏市场经济公式”,是多么迫切需要!

## ● “追求彻底”的理论才有力量 ●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若问董辅初经济理论的力量何从来,他自己生前已有明确答案:“理论要有力量,它必须是彻底的。”“理论必须彻底,只有彻底才具有力量。”而在他看来,“要使理论具有彻底性,就不能让理论去迁就反映事物本质的某些现象,迁就某种主观愿望,需要和考虑。”他深知,要完满地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但他强调,至少从我们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来说,应努力这样做。他在高度评价孙冶方时这样指出:“他的理论首先并且至少能够说服他自己,而在长期受批判中批判者没有能够提出使他信服的理论,反而使他对自已的理论具有坚定的信心。这就是说,理论的彻底性不仅具有说服他人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支持一种理论的创造者的力量。”

1979年之初,董辅初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经济科学必须在实践中前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我国经济科学如何实现当时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的论题出发,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他写道:“要使经济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必须尊重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我们认识

## ● “守身为大”才能“追求彻底” ●

理论上“追求彻底”谈何容易?“守身为大”才能“追求彻底”。这是董辅初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段的“现身说法”。

2004年4月25日,在美治病的董老师写了一篇题为《守身为大》的文章,对自己作为经济学学者的道德操守作了深刻阐述。董先生自己或许没想到,这篇文章竟然是他的封笔之作。

他写道,“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够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守身为大’固然是要求每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修养,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及社会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身’。因为‘保身’与‘守身’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就是董老师作为学者的道德准则,也是最高境界的学术精神。“守身为大”,是他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的最高境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1990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并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董辅初,对资本市场的试探性发展给予了充分的理论支持,有他1994年3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发表《证券市场是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城》为证:“证券市场是我国广大干部群众、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学习市场经济的大学城。证券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可以通过它学习现代市场经济的许多知识。”在后来发表的《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一文中,他将所有制和股份制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公有制有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两种形式,股份制就属于公众所有制,是对私有制的一种扬弃。为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作用,他积累了实际调查、国际比较、投资者利益等等多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为中国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基金市场的规范发展和有效运作提出了众多深刻而又务实的意见。《像对待婴儿那样爱护证券市场》一文,全面分析了有关证券市场投机、炒股、市盈率等方面问题,指出一切由于稚嫩产生的问题将在成长中逐步克服。这些论述,对当下资本市场发展,应该都是正能量。

董辅初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开拓者。改革开放以来,他写了大量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章。他把农村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的发展,看成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他在大量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了中国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实践进行了理论总结。他还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若干方面。他主张根据我国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认为像我国这样的大国不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而只能实行以内向发展为主的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战略。

董辅初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到战略的高度,并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阶段变化的角度提出了超越梯度发展的思想。他赞同资源配置要效率优先,但指出东部优先发展政策并不一定是有效率的,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效率提高效果是有时间条件的,随着改革发展阶段的变化,东部优先发展政策的效果也会发生变化。他认为中、西部的发展不应被梯度次序的设计所束缚。在地区间比较优势已经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应当适时调整政策,加快进行重点西移进程。董辅初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对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方面作出了独特的阐述,提出了为了使生产是可以持续的,必须注意资源的节约以及以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还必须保护环境。

董辅初始终呼吁支持发展民营经济。他以严谨的逻辑清晰地回答了“必须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与市场经济兼容,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与市场经济互为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反之亦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首先应归功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应该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其《保护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一文,则进一步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涉及到几个问题:一是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二是解决市场准入即允许私有企业进入哪些领域的问题;三是怎么样形成私营企业公平竞争环境或解除实际上对非公有制企业存有歧视的问题。由于上述旗帜鲜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董辅初又被誉为“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源泉,也是检验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根据近三十年的实践,勇于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管它们以往是否受到过批判;勇于抛弃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不管它们以往是否得到广泛宣扬。同时还要根据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的新的实践,勇于去探索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理论,不问它们从前是否见诸书本。”

董辅初曾多次对经济研究人员说,“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肥沃的土壤,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会结出丰硕之果,产生世界性的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试想,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多少复杂而又困难的经济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去解决。如果谁能透彻地研究了、解决了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岂止有中国的意义?”这段至理名言,是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他对自己几十年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作为导师的他经济学晚辈们的谆谆教诲。

作为在中国成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所关注和研究的始终是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对于这一耕耘对象,董辅初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正是他的经济理论的力量之源。

一个勤于实事求是且锐意创新耕耘的学者或能先知先觉发现真理,但未必能坚持其“先知先觉”的真理。因为有些真理,由于认识滞后或利益关联,在特定阶段可能不为某些人甚至多数人接受,尤其不为执政者所接受,要坚持将冒很大的个人风险。坚持探索发现真理更难能可贵。而作为学者之“守身”就在于坚持自己探索发现并认定的真理。这非常难能可贵,所以“为大”。

当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新的十字路口,许多新的矛盾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需要能抓住事物根本进而能说服人的彻底的理论。新时代呼唤新一代学者发扬董辅初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守身为大、追求彻底的学术精神,去探索发现并坚持抓住事物根本进而能说服人的“真”理论。这或许就是董辅初先生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

# 守身为大

□董辅初

1946年我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其他课程考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唯独记得国文的作文试题为“守身为大说”,我用文言文写了这篇作文。我究竟写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了。以后,虽然没有把这个试题作为座右铭,但是我一直铭记至今,而且常常想起,以鞭策自己。我的旧学底子不厚,不知道“守身为大”是否出自某典籍,但在古籍中类似的警句、格言是不少的。“守身为大”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坚守自身的节操是最重要的。

“守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内涵。例如说,在白色恐怖下,“守身”就是勇于斗争,不能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缩,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记得,临近解放前,斗争异常残酷,地下党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要求我们保持革命气节,坚持斗争,作为地下党员这就是“守身为大”的具体内涵。解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守身为大”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能否顶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成为能否“守身”的一个重要要求。但那时实行计划经济,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受到严格控制,以及许多商品的实物定量分配,因此,货币的功能有限,主要是计算的筹码,“糖衣炮弹”的袭击较易抵挡,“守身”的问题虽然仍很重要,但较容易。在转向市场经济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货币的功能大为扩大,虽然“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货币几乎可以买到一切。而且任何权力(政府官员的、公司老板和高级职员、事业单位的领导的,等等)都可转换成金钱。连学术职称也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于是,权力、地位、名誉、等等都与金钱挂上了钩,可以转换为金钱,而金钱也可以转换成权力(如买官)、地位、名誉等。当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官员经不住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的诱惑,堕落成为罪人,既令人愤恨,也令人痛心。其实,类似情况不仅发生在政府部门,而且发生在各行各业。连一向被认为清高的学术界也不是净土,为了追逐金钱、名誉、地位,有些人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相互吹捧拉拢,四处拉关系甚至花钱“拉选票”争项目、争职称、争头衔、争名次。据说,有人为了获得资助丰厚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先用各种办法获得一笔银行贷款,然后用银行贷款去做争取项目的“启动”,在拿到项目后,再用项目提成(规定项目的执行方有提成)的一部分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不仅如此,个人的各种消费也都以学术活动所需而在项目经费中报销。又如,有人为了评上教授职称,在提交的学术成果中,竟然列上谎称将在某出版社出版的于虚乌有的“学术著作”。

这当然不是说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本身就是罪恶的、肮脏的。它们之所以成为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追逐的对象,是因为它们存在和运行的制度和环境有严重缺陷,这些制度和环境例如有: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环境、社会监督的制度和环境、教育的制度和环境、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环境,等等。正是在这些存在严重缺陷的制度和环境下,提倡“守身为大”就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人是否为了追逐金钱、权力、地位、名誉等而做出违法乱纪、违背道德的行为,固然与有关的制度和环境存在严重缺陷有关系,但与其自己是否能“守身”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同样的制度和环境下,毕竟有更多的人坚持“守身为大”,没有陷入污泥浊水。而且即使在完善的制度和环境下,也会有人因为不注意“守身”而做出犯罪或不道德的行为。

上面谈的只是有关防腐败方面的“守身为大”问题,实际上“守身为大”的内容远不限于此。例如为官者能否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向上反映真实情况,就是一个内容。前几年粮食政策有失误,使国家和农民受到损失,地方政府难以实行。由于有些官员反映了政策实施中的真实情况而丢了官,有些官员就不敢讲真话了,致使决策部门未能及时纠正政策。这些官员就没有做到“守身为大”,坚守为官者应有的节操。又如,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有时甚至转变成政治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在这方面,于光远同志是一个典范,为学术界所敬重。他曾多次因为倡导改革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并几乎丢了党籍,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动摇。我曾参加过几个高层机构对他的批判会。我是唯一一个陪他受批者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激烈时,有位批判者竟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于光远也拍着桌子回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他的这种坚持真理的学术节操,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顶住了要我批判他的压力。相反地,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类情况,即原来为推进改革而曾站在理论前列的一些人,屈服于压力,做了检讨和自我批判,从而获得高升的报赏。由此可见,即使在理论研究上,进行“守身为大”也是很必要的。

“守身为大”固然是要求每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品德的修养,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及社会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身”。因为“保身”与“守身”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前所述,造成一些人“不择手段,甚至违法违纪地去追逐金钱、权力、地位、名誉,有着有关制度和环境存在严重缺陷的原因,要去除这方面的原因,但靠个人“保身”,不同流合污是远远不够的。固然改变和完善制度和环境不是仅靠个人的努力所能做到的,但是只管自己“明哲保身”,不努力从自身力所能及的方面去推进改革、完善这些制度(例如,监督官员的行为),未必能改变这种状况。相反,制度和环境改善了,个人的“守身”也有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不仅如此,既然只是提倡“保身”,有些人就可以丢弃原则,背弃真理,抛弃节操,以求自保。这与“守身”根本不同。这样的“保身”结果不是“守了身”,而是“失了身”。所以把“守身为大”消极地理解为“明哲保身”,是不对的。

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并实行“守身为大”这个警句和格言。(本文为董辅初生前所作的最后一篇文章)

# 纪念恩师董辅初

●孙志刚(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董老师是一位坚持理想信念、善于联系实际、勇于海纳百川、探索中国道路的经济学大师。他年轻时苦苦求索救国之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终生矢志不渝。改革开放后,他冲破旧思想观念的束缚,率先提出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实行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他又突破了市场万能论的观念,强调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效率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对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正在进行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东升(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辅初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会长)

我有幸成为他的博士生,在与他的交往中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陪他出差,在飞机上他一分一秒也不停歇,在座位上写文章;我们有位同学由于经营企业出现问题,他告诉我们不要歧视他,并要给他温暖帮助他;当他体检发现癌症住院,他见我们第一句话就是,他还有在读的博士生学业怎么办?这种伟大的精神让我无限敬佩!

●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董辅初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我是从研究生院毕业后以后到经济所工作,当时董老师是所长,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在体制内当过最大的官也就是到经济所不久被任命为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尽管短短几年,但确实是我自己在学术上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董老师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导师,但是我从来没有给董老师写过一个字的文章或者什么。他这个人做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现在无论经济还是政策上,确实是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政策选择期。秉承董老师的精神,仍然正当其时。

●毛振华(中诚信集团董事长、董辅初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今天,我们重温董辅初先生提出的重要理论,仍具有理论深刻性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改革之初,董辅初先生就率先石破天惊地提出中国改革要实行“政社分离、政企分离”,中国改革的核心在于所有制,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混合所有制。当前董辅初先生的所有制理论对新一轮改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虽然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与三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大幅提高,但在某些重要领域如金融、能源、电信等领域,向市场经济开放的程度还很低,所有制改革还要向前推进。董先生被誉为“民营经济的辩护人”,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奔走呼喊。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破除。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六年,董辅初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我们仍然需要以董辅初先生提出的重要经济理论为指导,继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将市场化改革道路坚持到底。



图为年轻时的董辅初



董辅初基金会公众平台